



英國漢德森爵士原著

使德辱命記

倪文宙 周公木 史萬 莫德 合譯
胡仲持 艾納 莫德 合譯



國華編譯社出版

英國漢德森爵士原著

倪文宙
胡仲持

周公木
艾納

史薦
莫德音

合譯

使德辱命記

國華編譯社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初版

使德辱命記 一冊

FAILURE OF A MISSION

每冊定價國幣貳圓

原著者 N. HENDERSON

倪文宙 周公木 史篤
胡仲持 艾納 莫德音

上海福州路
國華編譯社

上海福州路
國華編譯社

上海福州路二八一號
中國圖書服務社

上海河南路二〇號
龍門聯合書局

上海四川路中央大廈一〇四號
電話一七六七四

電話一七六一五
東亞書社

暨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開場白

「我努力謀求着和平，但當我向他們講着和平的時候，他們卻預備着戰爭了。」

——禱告書詩篇第×章第六首

我寫本書以前所抱的種種猶豫心理是格蘭薩謨的站長最後使我克服的。一個寒冷的早晨，我等候着誤了鐘點的到倫敦去列車，承格蘭薩謨君的好意，把我邀進了他那裝有火爐的辦公室。我們講談着關於戰爭及其起因的種種，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就是他和像他那樣的人們全不知道這事件的各種真相。

在這一卷以歷史的意義爲主旨的書裏我打算着把這事件的種種真相提示出來。我首先希望讀本書的諸君明白知道，這一卷裏所發表的各種觀察批評和意見都是純粹私人的，因而也就免不了錯誤和矛盾，可是連續發生的事件和事實本身卻完全根據於當時的電報、公文和信件，從而近情地說起來，都是極其確實的。

在所記載的事情剛纔過後就寫出的這種性質的書裏必然地有着若干隱諱的所在：第一，我擔任過駐在柏林的官職，當時是，現在也還是給英國政府辦事的。

第二，如果在正常的環境之下，我——至少在自己這樣早的時代——不會發興寫出文字來，談論那些近年來在私人間對我都又殷勤又客氣的人們。

不幸這環境並不是正常的環境，無論我私人的意向怎麼樣，我感覺着：那最後決定着我們外交政

策的性質的既然是英國公衆的意見，我也就在責任上應當把我進行使命的實情提供給本國人民知道；這使命是一九三七年四月國王任命我做他的駐柏林大使那時候託付給我的。

外交家的第一戒律就是把本國政府的各種見解忠實地傳達於駐在國政府，第二則也跟上一戒律相像，就是把駐在國政府的各種見解和立場一一地向本國政府說明。

第一戒律遠比第二容易遵守，實行起來是能够而且應該貫徹的。第二戒律則有時候實行起來困難得多了。我到柏林去，自心裏儘管有着種種的疑惑和恐懼，那地方儘管有着許多看不慣的情形，我卻打定了主意要盡我的能力來考察納粹政制好的和壞的兩方面，把納粹的抱負和觀點盡量客觀地解釋給我國政府知道。希特勒和納粹治理着德國，跟他們聯絡也就是我的責任。然而最重要的卻是我決定着努力求謀誠信的和平，要學首相那麼孜孜不倦地從事於這項工作的榜樣。

足有兩年，我癡心希望那出了軌的納粹革命在國內的及國際的生活上奪回轉到正常的文明的程序，希特勒的野心會有一個限度，而他的保證和宣告至少有幾種會包含幾句真話。有許多人也許認為我的執拗由於我沒有認識透納粹的甚而至於德國人的心理罷。這也許是對的，然而雖是今天，我也並不後悔當時一味相信德國的誠實和好意。無論有怎樣的事情發生，我總堅執地認為這樣的嘗試是得當的，而且決不至於因此吃什麼虧。反過來說，如果不作這樣的嘗試，那麼我們就不會以統一的帝國和民族來加入戰爭，我們後面也不會有中立意見方面道德的援助了。無論如何，事實還是直至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為止，雖然眼見了一九三八年哥德斯堡和慕尼黑黑的驚人舉動，我也不肯放棄那種希望。在柏拉格佔領之後，我還是照三月間所抱的種種主意繼續奮鬥，雖然那時候除卻來一個神蹟之外，一切希望是沒有了。

什麼神蹟也不會發生，到九月一日德國陸軍和空軍便侵入波蘭了。宣戰的形式一點也沒有，比這更明白的無端侵略的事件可還有着麼？的確，現在可以說了，在這日期以前一年半中間，我是一直苦悶着，覺得我們正在淒苦地經歷着一齣希臘悲劇裏的情節，快要到必然悲慘的不祥的結局了。承讀本書的諸君總該可以明白我的意思罷。希特勒從不想望着戰爭以外的最後目的。一人對於權力的意志和情欲會把不願戰爭的歐洲拖到戰爭裏，似乎是難以想像的。然而事實卻就是如此，數十百萬的男子呀，婦女呀，兒童呀，現在是要爲此受難而且死亡了。德國在歐洲人數最多，最有紀律又最勤勉的一個民族的祖國，一天受着希特勒及其祕密警察（蓋斯太波）和凡是代表着希特勒主義的人們的治理，就一天不能對於國際條約有一點信任，而在國內及國際的生活上有一點文明的措施了。

這就是我在希特勒的德國住了兩年餘之後我的深切的信念。我愛好着佩服着德國的人民，我自己已在他們中間覺着很自在，我又覺得他們比無論那一個外國的人們都更不生疏。一個繁榮的，滿足的幸福的德國是英國人最切要的指望。然而今日的德國人卻奉事着一個僞上帝，他們許多善良偉大的品性爲了那些邪惡的目的正在腐敗下去呢。非到德國回復了本身的個性，生活和思想上的個人自由，覺悟了武力的真正責任並不在壓迫弱者而在保護弱者，德國非到那時候是不能繁榮也不能享到幸福的。

我出國的期間已經有一世紀的三分之一了。先前有一年，我在英國足足過了六個月，這就是一九〇五。當年十二月我被派到聖彼得堡去就我第一次的官職。從那時起，我從未在英國一年中住到了四個月以上，我住在英國的期間總是遠沒有這麼長，有好多年裏我一次也不會回英格蘭來。可是每次回國來，我總受指謫於英國人民大眾方面基本的常識，健全的判斷以及批斷的才智之類。這一種指謫給

我的印象，再沒有比在今年九月及宣戰前數月間更深的了。我怕要說到過去兩年中間我在柏林的私人的經歷罷，然而這樣的紀錄裏，卻是不至於有一點東西足使英國公衆對於我們現在所進行的鬭爭的現實，在本能的體認上有所增減的。

在這鬭爭中間，我們本身沒有什麼物質的實益。我們憑着我們自己的自由精神，正在爲文明生活上各種道德標準而鬭爭，我們是充分體會到我們的責任以及肩負這種責任所要支付的代價的。這世代英國民族的一切優秀分子，尤其是青年已經獻身於爲未來的人類着想的高尚的主義了，我自己體察了這一偉大的事實，纔敢把本書奉獻於不列顛諸島的人們——在街頭，在工廠，在商舖，在鄉村的男女同胞們。

一九三九年十月。

目次

開場白

第一編

故事的背景

第一章 從倍諾斯愛勒到柏林

第二章 我的使命的背景

第三章 到柏林

第四章 一九三七年五月的德國

第五章 改善英德關係的嘗試

第六章 戈林

第七章 改善英德關係之進一步嘗試

第二編

戲劇的展開

第一章 序幕

第二章 第一幕：奧地利

第三章 第一插曲

第四章 第二幕：捷克斯拉夫：第一場：柏拉格

第五章	第二幕：第二場：慕尼黑	一〇一
第六章	第二插曲慕尼黑會議後希特勒的反感	一一七
第七章	中間之幕：四個月後回到柏林	一二五
第八章	分岔路上	一三三
第九章	第三幕：佔領柏拉格	一三九
第十章	第四幕：波蘭：第一場：英波協定	一四九
第十一章	第三插曲	一五五
第十二章	第四幕：第二場：戰爭	一六九
第十三章	離開柏林	一九七
收場白		二〇一
附錄		二〇三

使德辱命記

第一編 故事的背景

第一章 從倍諾斯愛勒到柏林

一九三七年一月，我在倍諾斯愛勒做着英國駐阿根廷大使，剛纔滿了一年的任期，我接了當時鮑爾溫內閣外交部長艾登打來的電報，要我接替着歐立克·斐浦斯（Eric Phipps）就駐柏林大使的職位，他是要在四月間調駐巴黎了。這電報註明着「私電」，我便請我的書記潘內發塞（Pennefather）幫着我把電碼譯出來；我初見到電報內容時候，心中所起的反應，至今還分明記得。反應是有三層：第一，我感覺到外交差使中間，那一個顯然最重要最困難的職位，對於我自己是不適切的；第二，從第一層引申出來，這意義無非是天意特別選定了我來擔任一種確定的使命，這我相信，就是爲保持世界和平而盡力；第三，我心裏忽然想到一個關於失敗和成功的拉丁的寓言，其中預示着一切的失敗所投放的泰爾本巖（Tarpeia rock）正緊靠着慶祝成功的神堂（Capitol）。要不是我的第二反應的現實，這我以爲壓倒了其他的一切考慮——勸誘着我，當時我接受艾登的建議也許要更加遲疑了。

三月中旬，我離開了倍諾斯愛勒。雖然我幼年時代曾經有過一個德國保姆，又在德國曾經留學過兩年光景，準備外交官試驗，可是在我服務國外的三十二年中間，我卻從未就過什麼操德語的職位，因此我的德語知識極其荒落了。一部分爲了這理由，我趁着德國郵船「甲浦·亞康那號」回英國去，隨

帶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兩部，在旅途上閱讀：一部是駐倍諾斯愛勒的德國大使給我的，另一部則是我私下辦到的未刪的版本。這書雖有若干部分嘔嘔累贅，假如縮短到三分之一那麼長，就該更容易閱讀罷，可見當時我卻也覺着像當初希特勒那樣教育和政治經驗顯得淺薄的人竟有這樣的作品，是值得注意的。

「甲浦·亞康那號」的船長是尼耶爾（Niejahr），他後來升到了北德船公司的總辦。船上的英國旅客都很喜歡他，這一批旅客中間有一位是故蒙德·丹普耳勳爵（Lord Mount Temple），他當時做着英德聯誼會的會長，但是到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虐害猶太人事件以後，卻辭職了。我跟尼耶爾船長攀談了幾次，他有一次指着自己的高頰骨，叫我注意，許多日耳曼人，尤其是普魯士人的血統中間混雜着大量的斯拉夫的族血。在上次大戰中間，我們看做敵人的與其說是日耳曼人，不如說是普魯士人，而在目前的大戰中間則敵人是納粹黨人，或希特勒的信徒，又復不是日耳曼民族，這並不是出於偶然的。雖然國社黨的實際領袖只有少數本是普魯士人，可是今日不亞於一九一四或一八七〇年那樣，在德國佔有優勢的卻還是普魯士的意識形態，尤其是他們的方法。

依照着民主政治，國家是為其人民服務的。依照着國家社會主義，則據希特勒所闡釋，國家是一切的一切，而國民沒有什麼個別的人格，只是由領袖人格化的國家的順從的奴隸；那領袖的意志是絕對的（元首地位）。「領袖」的原則直接從法西斯主義發生，但是除此以外，這一民族哲學的概念卻完全根據於對國家服務並且服從指揮這一種古老的普魯士理論，正如其傳道者伊曼紐爾·康德所宣示。戰鬪的普魯士主義有幾分由於其斯拉夫血統的混雜，由於德國東北部酷烈的氣候，又由於其素昔無可防禦的東部邊境逼得它採取軍國主義，這是公開的問題。然而普魯士人——雖是哥德也把他們

說得像野蠻人似的——終究是傑出的歐羅巴的標型，這把本身和本身的特徵在德國的其他部分留下了印記，而且從西方世界的觀點，這濫用了，或是濫用着秩序及效率，剛直及和善這種種西北部、西部及南部德意志的較純粹的日耳曼人所具有的品質；在國外旅行的英國人對於這些日耳曼人有着何等自然的同情呵。

「甲浦·亞康那號」船上的德國旅客中間有陀那伯爵夫婦（Count and Countess Dohna），我跟他們後來在東普魯士他們的芬肯斯坦（Finckenstein）古堡裏住過一回——這我過後還要講到；還有故后的妹子普魯士的腓特烈·雷奧波特公主（Princess Frederick Leopold），她這時候帶着她那唯一存留的兒子旅行，那兒子後來給納粹政府監禁起來了。

然而除卻在招待船長的小晚宴席上我有機會初次嘗試一番德語演說之外，旅程上最最有興味的事件就是我們遇着德國新飛船「興登堡號」，這是在五月間，在美國雷克·赫斯忒（Lakehurst）失事的，死了大批人。這飛船在從南美到德國的歸程追上了我們，於是把它的引擎調撥到速度同「甲浦·亞康那號」一樣，它高懸在我們頭上，相差約一五〇英尺，足足經過了五分或十分鐘，真是最動人的奇觀，同時則兩船之間交換着無線電報。等到這飛船又復把引擎開足了速度，它從我們眼前消失得多麼快，幾乎是難信的。

我在三月底邊的一天到了掃桑敦（Southampton）便在倫敦過了亂雜雜的一個月，跟好許多人會會面，又忙着就新職前必需的一切準備。最重要的不消說就是我跟尼微爾·張伯倫的會見，他當時做着財政大臣，但也已經是內定的首相，因為鮑爾溫早就宣布過等到加冕典禮以後當即退休的本意了，而加冕典禮是定五月十二日舉行的。張伯倫和我早就見過的鮑爾溫兩先生都以爲我會竭盡全

力跟德國現政府，也就是希特勒和納粹黨打交道的在民治的英國，不願個人自由而又迫害着宗教，猶太人和工會的納粹自然遠不是心目中看得慣的。然而他們都是一國的政府，而大使也並不是要在那一國批評那一國所選定或是所服從的政府纔被派到國外去的。竭盡我的能力來謀求對納粹政府的合作，這正是我的榮譽的義務，如同在倫敦的什麼大使儘管私自同情於自由黨或工黨反對派的政策是意識形態，卻不跟他們而跟當權的保守黨政府打交道一樣。我要設法跟納粹打交道，諒解他們的觀點，這種種企圖少不得遭受到我國許多人民的批評，在我是完全明白的。『照你的良心所吩咐那樣的幹，只求自己喝采就算了罷。』柏吞（Burton）所說的這一項生活行為的規律並不壞，只是這個人必須是很嚴格的自我批評家，有着幾個真實的正直的朋友，又並不輕易喝采的。確要是人遵守了這規律，他就武裝得很可以抵抗批評了。

不管是好是壞，總之張伯倫先生就他關於對德一般政策的見解給我指示了一個綱要，我想我可以老實說我是把他給我指定的一般路線遵循到底的，而且因為這路線跟我私自所懷抱的為本國在德効勞的概念密切符合的緣故，遵循着幹也就更加容易更加忠實了。我記得向張伯倫先生只提出了一項保留意見——這就是一面我竭力用最同情的態度跟納粹打交道，一面英國的重整軍備政策必須無情地遵守下去，因為除了武力的論據以外，什麼論據都對付不了希特勒政府呢。張伯倫先生懇切地對我說，他同樣地看重着這項意見，他自己的堅定的主意也如此。

凡是要跟納粹政府合作的為公的嘗試，少不得帶幾分別出心裁的成分，我記得因此又問過張伯倫先生，如果我想初到柏林時候，不免要有略略輕率的舉動，不知道他做首相的會不會加以反對。他的回答是意料中的輕率舉動有時是很有用的外交方式，他自己近來也有着這種價值的經驗。

第二章 我的使命

未來首相方面這一種諒解態度給我張了膽，四月二十九日我便動身到德國去了。然而在描述此後兩年間活劇的種種事件以前，我卻願意把我擔當對柏林的使命時候指導我的那些原則向我的讀者說個明白。

我最所深信的就是歐洲和平有賴於英德兩國諒解的實現。因此我打定了主意：第一在我權力以內，盡力跟納粹的領袖們聯絡，倘有可能，則爭取他們的信任，甚至於同情；第二儘可能客觀地研究德國問題，在我認為正當的地方，儘量公平地將那問題呈報我本國的政府。我在柏林的兩年又三個月期間，我始終遵守着這兩項規律。在不致犧牲我國的原則或是利益的地方，我忠實地求謀着了解德國對外的觀點，同時觀察其社會實驗上的優點，可是對於那些劣點也並不無視。我到德國去的使命是悲劇的失敗，但是在這方面，至少我自己的良知是明明白白的，現代的大使只不過是二十世紀政治機器中間一個小齒輪，但是誰也沒有像我這樣艱苦地爲榮譽的公正的和平而奮鬥。我的一切努力所以歸於失敗是由於一個單獨的個人及其利己的信徒們所結成的小黨派的狂妄的誇大狂和盲目的自信。我說這句話並非出於什麼怨恨，卻出於從兩年來密切的觀察和接觸得來的信念。因爲當前擺着一個事實：我們今日參加戰爭的目標之一就在不但爲了什麼大國，而且爲了全世界，要決定一下和平呢還是戰爭這一問題的緊要的裁斷權是否又要落在單獨的個人手裏；倘使如此那就是病態了。換句話說，這就是爭取民主政治原則的戰爭。

然而我在這裏所要注重的卻是一九三七年我到柏林去的時候激勵着我要使納粹政府獲致了跟我坦白合作的一切機會的那些意願的懇摯。我儘着希望最好的光景，直至最壞的光景證明我錯了爲止，我不肯相信別人的意願真是像表面那樣的惡劣，我並不錯在乖僻脾氣卻錯在樂觀。

我一遇到足以使德國人明白我所要採取的立場的時機，又都不曾錯過。我到柏林剛滿一個月，承蒙柏林的德英協會——這跟倫敦的英德聯誼會性質相當——設宴招待。協會的會長是很合適的人物，薩克思·柯堡·哥撒（Sax-Coburg-Gotha）的公爵 H·R·H。我在伊東讀書的時候就認識他是奧爾巴尼的公爵，一九〇三年我爲了外交官考試在波昂研習了三個月，他是同校的德國學生，一大批當權的納粹黨人參與着宴會，我利用了張伯倫先生給我的特許，就在席上演說的時候犯到輕率的毛病，這引起了英國若干方面苛酷的批評，給我在幾種英國報紙上博得了「我們駐柏林的納粹的英國大使」這一個雅號。我對於那次演說從未感覺到一點兒後悔。倘說我本國有一批人把我關於德國的報告看做「親」什麼外國是有益的，這也許不免是偏見罷，然而在這人人都免不了受到「親」此或「親」彼的標貼的當兒，這實在是無可避免的。

在我到德國去以前，我有過兩次同樣的皮相判斷的經驗。當卻那克和洛桑會議時代，我在君士坦丁的時候，哈林敦將軍（General Harington）和我自己都被稱爲「親土耳其」。他和我兩人在今日該都樂意接受這種稱譽罷。一九三〇年以後，我做着駐柏爾格雷德公使的時候大約因爲我恰巧是故王亞歷山大的朋友罷，我又復被判定爲「親南斯拉夫」「親獨裁者」了。

英國的人民往往忘記世界上有着比他們本國「更不幸福的地方」，也就不能理會甚至獨裁者對於一個民族在某一時期的也可以有着相當程度的需要，也可以說是極其有利。我說「相當程度」因

爲最初發明「獨裁者」來應付危機的古代羅馬人有比今日他們的後繼者們來得高明的地方，就是他們把獨裁者的權力謹慎地限制於幾個月的時期以內。就是講到英國，公允的歷史家也很少會否認克倫威爾（Cromwell）在內戰的禍難以後的效用，爲了同樣的理由我們也容易解釋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世界大戰的變局以後，歐洲所以有「獨裁者」的種子長發起來的道理。說來很可怪，希特勒本人——他是愛讀歷史的，自從他當權以後，尤其如此——牛賴特男爵（Barn von Neutrath）曾經對我說過，他的元首對於歷史遠比他自已弄得精博——曾有一個時期就克倫威爾作過特殊的研究；在希特勒看來，克倫威爾的種種質素中間有一種就是他好好兒死在牀上。戈林也有一次對我講起兩部關於那護國者的生涯的書名，希特勒也讀過的事實上，獨裁者們的確只有當權力進到他們的頭腦，而求謀永久的野心和欲望驅策他們從事壓迫或是冒險的時候，才變成了無可形容的對於自己臣民的罪惡，以及對於他們鄰國的危害。一切獨裁制度，即使是長期的，也並不見得無可容恕。凱末爾就古舊的廢墟建立了新土耳其，他的驅逐希臘人，也許暗示着希特勒，他應當在德國用同樣手段來對付猶太人，而這事件早就爲世人所忘卻所恕諒了。我們不能單因爲墨索里尼是獨裁者的緣故，拒絕承認他在意大利所成就的偉大的業績；如果希特勒知道何時何地停止，即使舉個例說，甚至在慕尼黑會議及紐倫堡對猶太人的法令以後，世人也不會不稱道希特勒是偉大的德國人。葡萄牙的現特裁者薩拉查博士（Dr. Salazar）是自定着他權力的限度而加以遵守的，他確乎可說是戰後時代歐洲所產生的最高明的政治家之一了。獨裁政治並不一定是罪惡，無論我們怎樣咀咒着這種原則，我們對於某一整個國家或是甚至整個制度，因爲其若干部分不良的緣故，就加以斥責是不公允的。有許多狗爲了名兒不吉利被絞死了也罷，可是對於納粹，在他們還未最後證明其有害到無可救藥的時候，我怎配直捷了當加

以斥責呢？無論如何，我是不承認任何人有權給我加上「親英派」以外的什麼名目的。我在離開倫敦以前曾經對艾登先生說過，我怕要遭受到「親德派」的雅號罷，如果直到我在柏林的任期終了，還有一批人繼續把我看作太過「親納粹」「親德」或是「親英國」除外的什麼，那就錯在那一批人了。而且，我在英國的若干方面得了這樣的名聲，使我心裏無論感着怎樣的苦惱，這苦惱從我爲英國利益的工作的觀點，總是給一種同情所壓住了，這就是我的態度的至誠不久所博得的德國一般公衆對我的同情。除卻頗有興味的一個例外，我在德英協會宴會席上的演詞全文是遍載於德國各報的。演詞快要結束的地方，爲鼓動德國婦女贊助我所籲求的和平起見，我引了一段歌詞，這我如果沒有記錯，是一九一六年美國舉行反戰的威爾遜選舉期間在那裏很風行的。這歌詞如下：

『我養兒子並不是要他當兵，

我養大了他，要他使得我高興快樂；

誰敢在他肩上放一枝毛瑟鎗

去殺別個母親所疼愛的孩子呢？』

我後來聽得人說，這歌詞是被他們故意刪除的，爲的是只怕德國做母親的真要心裏想一想：他們的兒子並不是生就要爲希特勒爲德國去死的。

我們也許可以說，一個大使只要關心着外交關係，用不着在演詞上牽涉到他駐在國的國內事件呢。然而德國卻並不是正常的國家，我們一講到德國就不能忽略納粹主義。事實上，我在這番演說中間也只是一小部分提及納粹；我在那裏一心要把我所要採取的對德國政府和納粹黨的態度坦白誠實地解釋一番，因爲實際上統治着德國的是納粹黨呢。這篇演說的全部主旨就是若干顯著的問題有着